

十年追梦

——从68届初中生到78级复旦大学学生
华子

40年前，我参加了77、78级两次高考。77级未被录取，78级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圆了大学梦。

江苏省77级有2轮考试，11月28日初试，12月23日复试。直到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文章，我才相信真的恢复了高考。这时，对我而言，考大学，是梦想，更如做梦。首先，我实际上只读了一年不到的初中，后来也与“文化”不沾边——1969年初投亲插队，因成分问题，我种地十年，成了干农活的一把好手。

江苏是农业高产区，高产是像绣花一样精耕细作的结果，精耕细作意味着我们得一年忙到头。一次“双抢”插秧，田里野菱的尖角刺进了脚，没空找挑秧，愣是等化了脓，连脓带刺一起挤出来的。除了忙，农村的文化元素更少，很难见到有字的纸。幸好还有“敬惜字纸”的习俗，让我的追寻不时也有收获。一次在一位小学校长家找到一本油印的《怎样识五线谱》，我饥不择食，对每个字符都研究了一番，直到自认为看懂了为止。1971年，队里会计悄悄告诉我一个信息：另一个公社的新华书店来了一批《新华字典》。我毫不犹豫，隔天走了36里路，花一块钱，抢购到一本。字典，那可是字字珠玑，偷档搂空就搞赏自己一点。那时虽已有电灯，但要节约用电，每家只准开一盏灯。我是投亲插队，这盏灯不可能在我桌旁。我备了一盏可调光小台灯，可调成5、3或2支光。经与生产队长软磨硬泡，而且保证只使用2支光，终于被破格获准使用台灯。由于电力不足，2支光的小灯泡只是微微发红而已，书只能离灯泡一寸远。脱粒时节，社员轮流加班，随着一捆捆谷物的喂入，脱粒机一阵阵加大马力，小灯泡就一次次熄灭。还经常停电，只能用煤油灯。因为按人口供应煤油，只能使用比较省油的、用墨水瓶自制的土灯。土灯亮度和高度都有限，灯放在书后、书侧都看不出，只能抱着灯看书。过不了多久，脸上、鼻孔里就被煤油烟熏得黑乎乎的。就这样，把一本《新华字典》从凡例一直看到化学元素周期表。虽然生存活剥、丢三忘四，但那时，她是我唯一的语文老师。

1974年，风声松动了一些，我也迁到陶文绫舅妈家。她在公社中学当初中语文老师，不时悄悄带回一本书，如《中国上古史演义》《德伯家的苔丝》，有一次是一套线装的《聊斋志异》。当时的规矩是：不能打听书的来源，保证按时还书。借阅期限有时只有一个晚上。我是计划外读者，只能她看上半夜，我看下半夜。好在照明条件已有改善，可以根据眼睛的疲劳程度，将台灯的亮度从2支光逐渐调到5支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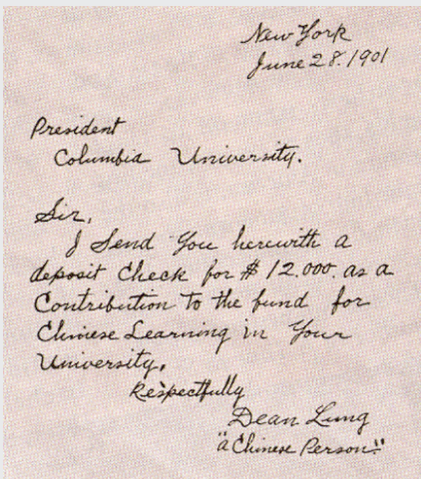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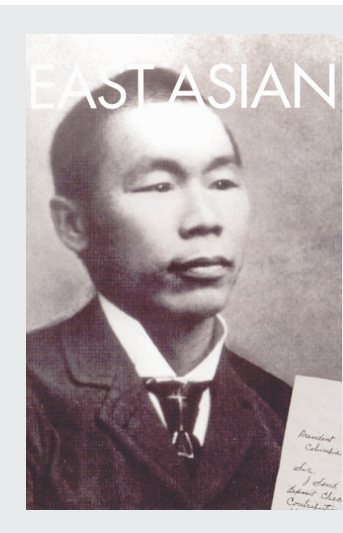
1974年，风声松动了一些，我也迁到陶文绫舅妈家。她在公社中学当初中语文老师，不时悄悄带回一本书，如《中国上古史演义》《德伯家的苔丝》，有一次是一套线装的《聊斋志异》。当时的规矩是：不能打听书的来源，保证按时还书。借阅期限有时只有一个晚上。我是计划外读者，只能她看上半夜，我看下半夜。好在照明条件已有改善，可以根据眼睛的疲劳程度，将台灯的亮度从2支光逐渐调到5支光。

1974年，风声松动了一些，我也迁到陶文绫舅妈家。她在公社中学当初中语文老师，不时悄悄带回一本书，如《中国上古史演义》《德伯家的苔丝》，有一次是一套线装的《聊斋志异》。当时的规矩是：不能打听书的来源，保证按时还书。借阅期限有时只有一个晚上。我是计划外读者，只能她看上半夜，我看下半夜。好在照明条件已有改善，可以根据眼睛的疲劳程度，将台灯的亮度从2支光逐渐调到5支光。

1974年，风声松动了一些，我也迁到陶文绫舅妈家。她在公社中学当初中语文老师，不时悄悄带回一本书，如《中国上古史演义》《德伯家的苔丝》，有一次是一套线装的《聊斋志异》。当时的规矩是：不能打听书的来源，保证按时还书。借阅期限有时只有一个晚上。我是计划外读者，只能她看上半夜，我看下半夜。好在照明条件已有改善，可以根据眼睛的疲劳程度，将台灯的亮度从2支光逐渐调到5支光。

看完上面的题目，大师是谁，不言而喻。而丁龙是谁，若是放在二十年前，能准确说出的人几乎不超过十个。但是自从我发表了关于丁龙和他创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考据文章后，几乎全世界华人对他都耳熟能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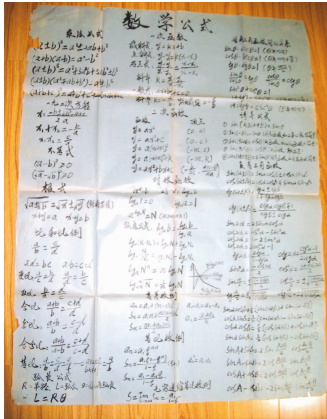
廿年前写《哥大与现代中国》一书时，为了考证美国汉学研究渊源的史实并回溯哥大东亚系的创建，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精研原始资料，特别着力于口述史和丁龙与哥大校长间的通信，发现哥大这个世界著名的汉学系（东亚系前身）是一个名叫丁龙的穷苦华人劳工发起创立的。这在世界教育史上称得上是一个奇迹——1901年（义和团运动 and 八国联军侵袭中国刚刚过去，华人在美国被称为“猪仔”），丁龙把自己一生辛劳的积蓄捐给一所世界名校，想建立一个汉学系研究中国，让西方



丁龙与他当年的捐款信



蜀河泥（右边是作者）



作者当年抄写的数学公式

可能看《聊斋志异》的人不多，能留两星期，容我逐字查字典。一字多解，要根据上下文挑一解；又要断句，才能读通。一行字可能要看来几遍。当然，慢慢地越看越快，最后可一目数行了。这套书啃下来后，文言阅读能力大为提高。后来应付语文卷中加标点、文言题的能力，主要来自于此。

文科要考五门。历史，是我的爱好。地理，从小是我的强项。时常为人代笔大批判稿、学毛选经验交流稿，政治的问题似乎也不大。只有数学是拦路虎。好在我的初中是在控江中学读的，遇到了很好的数学老师胡庚麟。他孤儿出身，自学成才；要求我们学在他教学进度的前面。他上课，深入浅出，比喻恰到好处；如何解题一带而过，却花大量时间推导定理。书上定理都用长方形框框着，像条头糕。数学课总排在上午第四节。每次推导，他就会露出一脸坏笑：“肚子饿了吧，给你们吃根条头糕。”久而久之，“条头糕”就成了他的绰号。经他引导，我们知道必须透彻理解定理，才能应付千变万化的题目；班上自学数学成风，暗暗较劲，看谁学得更快。当时的自修课最兴奋，七八个人将座位挨到一起，有人叫“一、二、三——开始”，各人每做好一题就报答案，看谁做得又快又准确。

虽会自学，还是困难重重。首先，没有教材和老师。我父母不是知识分子，不可能得到《数理化自学丛书》之类紧俏书。幸好，我们大队团支部书记是当地高中毕业生，留有一套教材。她也要考大学。复习之初，我们两人进度差不多，同一本书，她白天看，我晚上学；遇难题共同切磋，仍不能解决的，留待请教老师。积累了一批难题后，我们走了三四里路到了她的母校。老师身边围了七八个学生，估计半天都轮不到我们。只能回家，搁置难题。学到后面，再看难题，大多可以迎刃而解。非

常可惜，她未能考上大学。

其次，时间太紧。从确信恢复高考到初试只有38天。我立即进入应急状态，时间以“分”来计算和安排。多次熬过通宵，实在太累了，和衣在被子上靠一会，以省下脱衣服和叠被子的时间。急速复习了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数学，自学了后五年的数学，就去参加了高考。

好事必须多磨——我参加了复试，未被录取。两轮各考几分，不得而知。我一直以为是考分不够。二十多年后才知，77级还看成分。不过，77级即使被录取，恐怕也进不了复旦。

紧接着是78级高考。我犹豫了，考还是不考？年龄偏大、女性、英语全忘，三个不利因素让我退却了。幸亏遇到了高人点拨和帮助。陶文绫老师劝我：“高个子上届都考上走了，这届是在剩下的矮子里面挑将军，你参加过复试，你就是将军。我们学校办了高复班，免费为大家复习，我可以介绍你进去。”我再次振作精神，成了高复班的插班生。这时，离高考还有97天。

对我来说，高复班太给力了。有老师，有油印教材。教历史和地理的是张瑞麟老师。他是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

“文革”前的毕业生，讲课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教室四周墙上挂满各种地图：天体地理、世界的、中国的、交通、矿产、港口、人口……我进班时，地理已经讲完。张老师每节历史课留5分钟，概要地再讲地理。他对同学们说，如果每天不讲一点，恐怕你们学完历史已经把地理忘了，但私下对我说，这5分钟是为你讲的。考前连续三个晚上，他拿着考试大纲，听我讲历史和地理，他纠正和补充。结果，我这两门课都得了高分。政治老师本身就是考生，备课特认真，我获益匪浅。语文有两位老师，我的作文本上都能看到他们的精心批改。

最难的还是数学，占用了我三分之二的时间和精力。急学过的又忘了不少，只能从头再来，但是感觉比当初容易多了。数学公式没推导过，不巩固，只能用毛笔全部抄了挂在墙上，抬头能见，强记硬背。又抄一张小纸，临进考场再背一遍，进去即上缴监考老师。发下考卷，先粗看各题可能用哪些公式，写在草稿纸上。记得数学共5题，每题20分。仔细一看，真正会做的只有第一题，心绪大乱。第一题有5小题，每小题4分。慌乱中，错了1小题。边做边调整心态：我只是68届初中生，考不上很正常，考上了是偶然。第一题做完，心态已调整好，再看第二题，也不在话下。第三题花了很长时间，又攻下了。第四题应该做不出，只是不想浪费时间，试试看而已。谁知，连猜带蒙也做出来了，但不知对不对。第五题不知从哪里下手，稍看了一眼，时间已到。出了考场，才知道已下过一场大暴雨，考试中竟全然不知。高复班老师等在门口与我们对答案，第四题居然答对了！结果，数学得了76分，以407的总分跨过复旦的门槛。我们高复班文科有两个班，只考取二人：政治老师和我。老师们戏言，文科班是专为我办的（进复旦后才知，我的年龄属中等，性别无歧视，英语成绩并不参考）。

回到正题。能圆大学梦，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是好运连连：首先，遇到三位好老师：胡庚麟老师给了我自学的方法和勇气；陶文绫老师带着我读书，在我彷徨时，将我人生的轨迹拨了一下；张瑞麟老师帮我提高了两门课的成绩。关键的好运是连猜带蒙的数学题做对了。必然性是有梦、追梦。没有梦，哪有《新华字典》《聊斋志异》们；没有白天苦干、晚上苦读模式下的积累，恐怕也无法应付文科的高考。十年追梦，68终成78。



疾风三号
(油画)
闻立鹏

大师小错：钱穆说丁龙

海龙

曼哈顿看过来

人了解中国文化，尊重他祖国的文明和人民。在其主人卡本蒂的帮助下，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他播下的种子结出了硕果。

但近来翻阅史籍，笔者发现一位现代学者对此事也有过说法，可惜他的叙述语焉不详而且有很多基本史实错误，这位学者就是钱穆先生。钱先生是中国史学泰斗级的人物，文章在海外有深广

的影响力，因此值得在此作一番辨析。关于丁龙，钱穆有这样一段绘声绘色的论述：

“百年前山东有一华侨，名丁龙，居纽约。林肯总统时代，一将军退役后一人独居。雇一男仆，治理家务。但此将军性好浪漫，仆人辄不终约而去。丁龙亦曾为其家仆，亦以遭骂辞去。后此将军家遭火灾，独居极狼狈。丁龙闻之，去其家，愿复充仆役，谓其家乡有古圣人孔子，曾教人以恕道，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将军遭火灾，独居，余曾为将军仆，闻讯不忍，愿请复役。此将军大叹赏，谓：不知君乃读书人，能读古圣人书。丁龙言：余不识字，非读书人，孔子训乃由父亲告之。将军谓：汝父是一读书人，亦大佳。丁龙又谓，余父亦不识字，非一读书人。祖父、曾祖父亦然。乃由上代家训，世相传，知有此。此将军大加欣赏，再不加骂，同居相处如朋友。积有年，丁龙病，告将军：余在将军家，食住无虑，将军所赐工资积之有年。今将死，在此无熟友，家乡无妻室，愿以此款率还将军，以志积年相敬之私。丁龙卒。此将军乃将丁龙积款倍加其额，成一巨款，捐赠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一讲座，名之曰‘丁龙讲座’，以专门研究

中国文化为宗旨。至今此讲座尚在。但余居北平教读北大、清华、燕京三大学，教授多数以上全自美国留学归来，亦有自哥伦比亚毕业来者，但迄未闻人告余丁龙事。及余亲去美国，始获闻之。及归港、台，乃为宣传……”（钱穆全集《中国史学发微·略论中国历史人物之一例》）

钱穆的记述看起来很像详实，但可惜内容错误太多；而且其所叙故事和史实混乱。这跟他治古史一以贯之求真求实的风格相比，未免大相径庭。

让我们来看看具体情形：一，丁龙之籍贯在今天所能看到的材料中皆没有确论，有说广东，有说山东，皆属臆测。钱文根据他祖上能引用孔子语录就断言他是山东人，似嫌武断。二，丁龙的主人不是什么“退役将军”，而是一个成功商人、律师、慈善家并出任哥大校长校董。他名叫卡本蒂埃，是哥大毕业生；毕业后赶上淘金热，去西部成功致富，创建了加州奥克兰市，自己任市长并建立民团、自封将军，后来把奥克兰市交给了联邦政府。他喜欢用将军这个头衔，钱穆大约是望文生义，以为他出身军旅。三，丁龙1901年捐款时并未“将死”。我手上有他1905年仍在国际间旅行的美国移民局文件，证明他身

新西兰机场一个穿制服的女人让我跟她走，走到头，指着靠墙的长凳子：坐那儿吧，海关官员一会儿过来。看到凳子的同时，我看到墙上的大字：“Crime Zone”，血红。这是进机场的“犯法区”了，还好，有凳子坐，对我也和气，没有厉声呵斥蹲下。我木木坐下，不是吓呆了，是乏呆了。

太累了——我当时正在澳洲旅游，凌晨6点的航班，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飞往新西兰，从住处到墨尔本机场50分钟，深夜街上静悄悄的时候，4点钟出门只能早不能晚。凌晨2点半起床，也许只睡了个把小时，或者似睡非睡，根本没有进入恢复阶段。在这之前的四五天中，每天也是大概五个小时的睡眠，连日奔波，师老兵疲一触即溃，这似睡非睡的个把小时是封穴一击，把我打得呆若木鸡。

且说我昏头胀脑飞四个多小时从墨尔本抵达奥克兰，出关走“Smart Gate”。这个好，无人把手，正不想说话，把护照放机器上，手指触屏回答问题，拿上它吐出的通行证走人。还剩检查行李最后一关，先生的室友已经等在出口外准备请我们吃饭。走到闸门，穿制服的人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夸张的大牌子和标语上写的是：“最后的机会！”“扔了，还是受罚？”我扫了一眼标语牌子，把手袋放上检查带，昂首走过闸门，民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这是胡说，应该是心中坦荡，没有戚戚之忧。走过去等手袋过关，一个穿制服的人问：这是谁的袋子？我上前认领。他说需要打开检查。查吧。他从袋子里拿出一芒果，这样，我被带进“犯法区”，那个芒果，被我彻底忘了。

临出门前，我看到桌上有个芒果，随手放进手袋里。半夜三更起床的胃口像挑食的孩子，哄着也只喝几口水，途中我一定需要水果。

怎么把这个芒果忘了？呆若木鸡了呗。我坐在凳子上等海关官员，不急不行，醒醒，“犯法区”了，好不好。一会儿见了海关官员，我应该强打精神，顾盼相迎，还是黯然低回，痛心疾首？不知道这次芒果的事儿有多大，看那磨刀霍霍的阵势，怕是要引颈待斩了，什么表情都无济于事。浑浑噩噩胡思乱想，20分钟后，海关官员终于开门出来，两米多高的个子，花白头发，有些刚忙完其他事的匆忙，倒是比迈着四方步的大摇大摆少了衙气。他带我们到旁边的柜台前，把胳膊放柜台上，上身半伏问我：这芒果是在你手袋里发现的？明知故问，但

经历「犯法区」

紫贝

我知道那是程序，他必须听到我承认。这样伏在柜台上的讯问好像不很正规，不正规好，不那么吓人。

你们来新西兰做什么，准备呆多久？旅游，大约10天。他让我们拿出护照，敲进电脑检查，回来还是伏在柜台上：告诉我，为什么把这个芒果带进来，你在飞机上应该得到资料，新西兰禁止肉，蛋，水果，蔬菜等生物食品进关。还有，你没有看见那边的大牌子和标语吗？我老老实实回答：我知道新西兰的规定，我把这个芒果忘了。凌晨2点钟起床赶飞机，没有吃任何事物，我准备在途中吃了它，但是忘了，我不是有意把它带进新西兰。他重复我的话：你忘了？一边打量我，我面无表情。我相信你的话，他说，但这事非同小可，不是小题大做，几年前有人从澳大利亚带进来一只携带病菌的橘子，害得新西兰政府花费了上千万新元，所以我们三令五申，严加管制。他说着拿出一纸公文：我们必须按规定处理，这上边有四种方案，你可以任选一种，好好读读，想好后告诉我。

他留下那纸公文，转身走进门里，我看着他身后关上的铁门，有些泄气，到底要被砍一刀了，他们擅长穿越于冰火两重天，在和颜六色的热与照章办事的冷之间游刃有余。我和先生回到凳子上看公文，第一，交400新币罚款完事。第二，两周内上交400新币罚款，网上付也好，打电话交也行，接受邮寄支票，不拒绝亲自送钱。第三，提出申诉，两周后开庭。第四，不交钱，也不申诉，等新西兰高等法院的裁决。看了两遍，第三条首先出局，没有二周时间上法庭。第二条也是多此一举，既然痛，长痛不如短痛，干脆现在交给他400大洋，有敢于忘记的豪气，就应该有敢于承担的勇气，省得在以后的旅途中被这段不了公案冷不丁戳一下，怪不和谐的。

他从门里出来，把我们叫到柜台前，还是那个姿势，胳膊放柜台，上身半伏：看明白了吧，选哪条？我说：第一条，交罚款。很好，他认真地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没有告诉你选哪个，你有选择其中任何一条的权利。他好像在强调“任何一条”，我和先生对视一眼，突然有些顿悟。问他：如果我选第四条，高等法院最坏的判决是什么？400新币罚款，他认真地回答。当年陈胜吴广没有选择，“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逃跑、造反都是死，干脆反了，我这明明有生机，干嘛当场就义，真是呆了。于是他对他说：我改变主意，选第四条。很好，他说，你有权选任何一条，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他重复一遍刚才的话。又说：签个字，你们可以走了。好喜欢他这样办差，认真。转身走出“犯法区”，室友迎上来：怎么回事，人早走完了。

秋去冬来，没有见到来自南半球的罚款通知。春也走，夏又至，我差不多把新西兰高等法院的裁决忘了。偶尔腹念：大概是免罚了，虽然裁决权在最高法院，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个经验丰富的海关官员，看在我良民和态度诚恳的分上，有意无意以教育为主呢？我给自己总结：出门旅游遇到这种事，要冷静诚实，陈明原委，有错认错。更重要的是，接受教训，面对法规条文时，不论巨细，不能呆头呆脑犯糊涂。

中国海关打老虎，目光常放在名贵东西上，回美国截然不同，飞机还在天上，就让你填表，有没有带水果，有没有带蔬菜，有没有带肉类，没完没了，打破砂锅问到底。如果有，入海关时必须交给山姆大叔，秘而不宣很难蒙混过关，除了安检带扫描，还有狗鼻子追踪。有一次在洛杉矶机场，我看到一个中国大妈掏出一只一尺多长的烤乳猪，旁边狼狗的舌头伸出半尺长。澳大利亚也不含糊，这不准带，那不准带，斤斤计较，以后要记住进机场前要把水果小点统统扔进垃圾桶里，无论多么恋恋都得割舍。